
東漢、三國、西晉時期 謠的敘述*

永田拓治

阪南大學國際學部國際交流學科

中國自古以來就曾以謠作為歷史敘述的題材。所謂謠，指的是無伴奏的歌。謠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為對彰顯或批判對象進行直接吟唱的謠，用以區別政治的善與惡；另一為蘊含預言性質的謠。兩者自古以來，都是歷代王朝無法忽視的輿情。雖然謠不時辛辣批評執政者，卻因其匿名，不易為當權者所封禁。本研究將考察的起點置於謠被敘述——即「音聲世界的謠」被蒐集而轉向「文字世界的謠」——的時點。在此基礎之上，以「文字世界的謠」為考察對象，探討記錄作為文字的「謠」在歷史敘述中的重要性，並考察這些文字要素的社會意義。

關鍵詞：謠 「音聲世界的謠」 「文字世界的謠」 司馬彪
《續漢書·五行志》

* 本研究得到了 JSPS 科研費 JP22K00934 的資助。

一、前言

在東漢、三國、西晉時期所編撰的「史書」中，散見有謠的相關敘述。所謂謠，《爾雅》言「徒歌謂之謠」，¹指無伴奏的歌。謠有時旨在稱頌執政者之善政，有時則對為政者的惡政予以辛辣批判。

概言之，謠可以分為兩類。(一)直接的謠——直接對彰顯或批判對象進行吟唱，作為判別政治善惡的指標；(二)蘊含預言性，或被視為蘊含預言性的「謠」。

自古以來，無論是上文中的(一)還是(二)，謠一直都是歷代王朝不可忽略的輿情展現。它早在周代就已出現。謠不時對為政者進行辛辣批判，卻因其匿名屬性，對於當時的權力者而言，頗不易封禁。但同時，因其預言性，「謠」也被認為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²

志村良治(Shimura Ryoji, 1928–1984)曾將「謠」定名為「災異的歌謠」，並就「謠」(尤指「童謠」)與為政者之間的關係，有如下明確論述：「為政者將童謠作為政治之資鑑，聽取童謠而以為鑑

-
- 1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釋樂第七〉，頁2602。
 - 2 相關先行研究，請參考以下文獻。瀧遼一(Taki Ryoichi)：〈三國時代の歌謠についての私見〉，《東方學報》(東京)第11冊之3(1940年)，頁153–182。朱自清：《中國歌謠》(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天鷹：《中國古代歌謠散論》(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增田清秀：《樂府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1975年)。多賀浪砂(Taga Namisa)：〈干寶《搜神記》と《漢書》《晉書》五行志〉，《九州中國學會報》第23卷(1981年)，頁26–36。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歷史學報》第10期(1982年)，頁19–52。雷群明：〈一份應該重視的遺產——中國古代童謠試論〉，《瀋陽師範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3期，頁108–113。志村良治：〈災異的歌謠〉，收入氏著：《中國詩論集(志村良治博士著作集I)》(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頁73–88。柳瀨喜代志(Yanase Kiyoshi)：〈童謠考——搜神記「由拳陷沒為湖」話をめぐって〉，《中國詩文論叢》第5集(1986年)，頁137–148。狩野雄(Kano Yu)：〈歌謠としての古樂府——歌われた「場」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文化》第60卷第3、4號(1997年)，頁193–211。馬新：〈時政謠諺與兩漢民眾參與意識〉，《齊魯學刊》2001年第6期，頁82–88。李傳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歌謠風議與官民互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132–136。呂宗力：《漢代的謠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戒——這一理解原本是對通過採詩而察取民風的前代傳統之繼承。實則，謠在此之上又增加了其他的效用。童謠作為卜筮之一種而被蒐集。換言之，童謠作為預言吉凶之歌詠而受到信賴……這類歌詠先就現象進行吟唱，預測吉凶，傳達社會變動，自然蘊含了向為政者所施的諷刺。童謠乃是引領這一世間政治之存在」。³

又，增田清秀（Masuda Kiyohide，1915–1990）指出：「史家透過星氣讖緯思想的過濾，觀察民間的歌謠。因此，作為創作者的庶民或兒童，成為『五星』或『熒惑』的化身，即決定未來吉凶禍福或者成敗的、具有超能力者的形象；實際上，這雖然是其自身的附託，但史家卻視之為能力者發出的至上命令。因此，能準確預測未來吉凶禍福或成敗的，庶民以為是史家，而史家則以為是庶民，即具有超能力者；史家認為包含童謠在內的歌謠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因即在於此」。⁴ 此處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其一是將謠與星氣讖緯思想結合，其二是將其創作者視為庶民（或兒童）。

針對這一蘊含預言性的「謠」的研究，串田久治（Kushida Hisaharu）曾有詳細整理。⁵ 串田參考既往以文學視角為中心的研究狀況，轉以從社會思想史的角度對「謠」加以考察。⁶ 串田指出，所謂「謠」，乃是：當時有知識的人假託兒童或庶民之口，宣洩其對於政治、社會的不平不滿，並藉助其廣為流傳的性質，而期待對特定權力者或權力機關施加影響力的語言形式。⁷ 串田對於「謠」研究的態度有二，其一為：

歷史書中所記錄的「謠」，不過是在時間、空間推移之中不斷修正的結果。重要的是，必須逐個考察「謠」的

3 志村良治：〈災異的歌謠〉，頁 78。按：日文引文部分均由本文作者自行漢譯，下同。

4 增田清秀：《樂府の歴史的研究》，頁 190。

5 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東京：創文社，1999 年）。

6 同上注，頁 28。

7 同上注。

社會意義，以明確現存「謠」的意圖究竟何在、假託何物。⁸

至於其創作者問題，針對增田所主張的庶民說，串田則以為是有知識的人。其二為：

雖然從比較早期開始，中國就曾留意到「謠」之中的「童謠」，但是，既有的研究卻僅對「謠」的存在進行總論，罕有就逐個童謠的內容加以考察者，亦無詳細考察相關事實關係、而對「童謠」所隱含的意味加以討論者。更遑論對記錄「童謠」的史家之真意的嘗試探討。⁹

乍看之下，一與二似皆試圖逐個考察「謠」或「童謠」所假託的意圖，這是二者共通的學術立場。實則，兩者之間存在著決定性差異。這是因為，「逐個的『謠』所假託的意圖」，因其創作者、傳唱者與蒐集記錄者，以及據此文字記錄加以敘述者的不同，其意圖也各自有異。故而，有必要就此認真區分、分析。

若是稍詳言之，則一旨在由文獻史料中所敘述的謠（下文作「文字世界的謠」），對社會中所流傳、伴隨音律之謠（下文作「音聲世界的謠」）的實態加以解釋（闡明從「文字世界的謠」到「音聲世界的謠」）；與此相對，二則旨在闡明史家以「謠」作為「文字」敘述的真意（闡明由「文字世界的謠」至「文字世界的謠」）。二者在理解和方法論上，有著決定性差異。

之所以產生這一混淆現象，正如雷群明所指出，儘管童謠是一種帶有音樂性的口頭文學，但是古人在蒐集童謠之際，卻僅僅留意其所記錄的文字，對於附帶的旋律或韻律則等閒視之；¹⁰ 導致「謠」的旋律或韻律要素因此被忽略。更進一步的問題還在於，雖然「謠」

8 同上注，頁 27。

9 同上注，頁 11。

10 雷群明：〈一份應該重視的遺產——中國古代童謠試論〉，頁 111。

由「旋律或韻律」與「歌詞」構成，¹¹ 然而仍有部分研究並未明確指出，作為闡釋「謠」的方法僅限於無「音（旋律或韻律）」的文獻史料這一事實。¹²

加之，在既有的研究之中，雖然就「音聲世界的謠」如何被彙集起來並被記錄成文字有所探討，但就史家如何敘述這一點則討論得並不充分。而關於「音聲世界的謠」的蒐集與敘述過程、蘊含預言性的「謠」與無預言性的「謠」如何分類，也同樣未被納入既有研究的考察中。

是以，本文將對「音聲世界的謠」與「文字世界的謠」¹³ 進行整理，並對相關時代歷史特質的謠（直接的謠、被視為蘊含預言性的「謠」）為何可以作為研究對象加以探討。在此基礎之上，就東漢、三國、西晉時期「謠」之敘述的變遷與相關時代的歷史特質如何關聯加以考察。

二、「音聲世界的謠」與「文字世界的謠」

自古以來謠即與中國政治有著密切聯繫，無需贅言。此處舉東漢時期一例。《後漢書·黨錮列傳》之〈范滂傳〉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云：

-
- 11 日本中世史中，關於音聲這種信息，學者多有議論。其中，酒井紀美（Sakai Kimi）認為，以輿論之口或耳為媒介不斷擴大的「うわさ」（童謠、巷說、風聞等），在日本中世社會佔有重要位置，是構成「音聲世界」一環的存在。是說頗具啟發。參考酒井紀美：《中世のうわさ：情報伝達のしくみ》（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頁214-219。
- 12 酒井前揭書謂：「從被書寫的文字史料中，試圖尋找被言說的『謠言』實體、話語的集合體，因而，其中的困難自不待言」，指出由「文字」復原為「音聲」之難。參考酒井紀美：《中世のうわさ：情報伝達のしくみ》，頁203。
- 13 關於將謠言分為「音聲世界的謠」與「文字世界的謠」而加以考察這一研究視角，筆者曾受到 Walter J. Ong 著，桜井直文（Sakurai Naofumi）、林正寬、糟谷啓介（Kasuya Keisuke）譯：《声の文化と文字の文化》（東京：藤原書店，1991年），酒井紀美：《中世のうわさ：情報伝達のしくみ》，大黒俊二（Ooguro Shunji）：《声と文字》（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等啟發。

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¹⁴

由此可知，其時曾有明文規定，¹⁵三公每年聽取地方長官之善惡與民之疾苦，而後上奏。¹⁶此處可注意以下兩點：其一，調查聽取州郡地方長官的治政評價與民眾疾苦，其政策稱之為「舉謠言」；其二，記錄蒐集與報告「音聲世界的謠」的過程。

首先就地方長官之評價，《藝文類聚》卷五十〈職官部六〉「太守」條引《東觀漢記》云：

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¹⁷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

14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六七，頁2204。

15 《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謂「〔熹平〕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頁1996。

16 關於東漢時期謠言與地方統治之關係，見胡守爲：〈「舉謠言」與東漢吏政〉，《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頁64-69。

17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二六〇，〈職官部五八·良太守上〉，頁1219，引《東觀漢記》謂：「張堪，字君遊。遷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童謠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是作「童謠」。而《太平御覽》，卷四六五，〈人事部一〇六·歌〉，頁2138，引《東觀漢記》作：「張堪爲漁陽太守，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則非童謠，而以其爲歌。

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¹⁸

據此，可知稱頌朱暉、張堪、廉范等郡太守治政的歌（或童謠）被採錄。這一敘述證實當時確曾蒐集與記錄謠。然而另一方面，在現存《東觀漢記》佚文之中，卻無從確認存在蘊含預言性的謠。

又，《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云：「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¹⁹雖然相關歌詞具體內容不明，但冀州刺史公孫度確實因謠言而被免官，這一記述表明謠言甚至與官僚罷免相關聯。《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下文作裴注）引《魏書》云：

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敕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²⁰

靈帝聽取曹操上奏，下詔三府（三公之官府），根據民眾所作謠言而罷免地方官吏。由此可知，原本具有任官、官職黜陟等重要作用的謠言，因三公腐敗之故而機能不全。

下文考察謠言之蒐集與記錄。伴有旋律或韻律的「音聲世界的謠」，在捨棄音律而以文字記錄後，由三公加以匯總整理，再行上奏。在殿堂之上以口頭進行報告的「文字世界的謠」故而再度獲得了音聲（不過，此時無從確定是否以謠的原本音律再現）。

18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五〇，頁903。

19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八，〈魏書·公孫度傳〉，頁252。

20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3。

此處重要的是，其後對所蒐集的「音聲世界的謠」進行記錄時，其中歌、謠與童謠的分類。儘管謠言的傳唱者未必先瞭然於歌、謠、童謠之間的區別就進行演唱，但我們必須注意，發展為「文字世界的謠」確實被冠以了謠、童謠等之名。

此外，如後文所示，同一首謠因語境不同被冠以不同名稱而進行敘述的例子處處可見。採錄自音聲世界的謠言，在捨棄音聲後而作為文字被記錄。此後，在這些文字記錄的基礎之上，再施以諸種敘述行為。換言之，可以斷定，歌、謠、童謠這樣的分類是採錄者、乃至敘述者所為。既往研究中卻並未對此予以充分考慮。

因此，下文將「音聲世界的謠」視為「文字世界的謠」的敘述語境；換言之，本研究是以文字記錄的語言作為分析的起點的。

表 1 「音聲世界的謠」向「文字世界的謠」發展的過程

音聲世界的謠的發生⇒不特定多數的聽眾⇒音聲世界的謠的擴大傳播（①伴有曲調的謠②僅剩歌詞的謠③各種解釋）⇒傳播過程中的變化（①曲調變化②歌詞變化③解釋變化）⇒音聲世界的謠的收集與記錄（歌詞與解釋的文字化及其分類）⇒文字世界的謠的流通⇒各種敘述行為
--

在使用這一分析方法時，首先需要確認的是，「音聲世界的謠」與「文字世界的謠」二者究竟如何區別。言及兩者的差異，無庸置疑，首先就是曲調的有無。然而，此處更需留意的是，「文字世界的謠」由於文字化而失去了聽眾。「音聲世界的謠」對於其聽眾而言，有著諸多解釋的可能，其歌詞也是豐富多彩。然而，失去音聲、即失去聽眾的謠，則導致了可稱之為「謠的階層化」的現象。「音聲世界的謠」只要有聽眾，其對象就有可能擴展至各種階層。而「文字世界的謠」的對象，雖然因為簡牘或紙的記錄而可能流布至更廣範圍，但僅限定於識字階層。

這其中，蘊含預言性的「謠」的階層化最為顯著。象徵著「謠」面向識字階層的現象，有如「拆字」²¹之例。《三國志》卷六〈魏書〉

21 關於「拆字」，參考高田時雄（Takata Tokio）：〈拆字考〉，收入江口一久（Eguchi Kazuhisa）編：《ことば遊びの民族誌》（東京：大修館書店，1990年），頁193-201。論之甚詳。

董卓傳〉裴注引王粲《英雄記》記錄：「時有謠言曰：『千里艸，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²² 在這一「謠」中，「千里艸」→「艸+里+千」=「董」，「十日卜」→「卜+日+十」=「卓」，從此二字，是知為吟唱董卓，暗示其榮華不永之義。由於此「謠」作為「文字世界的謠」而被記錄，其效果遂得以增強。

「拆字」之「謠」的存在表明，並非僅有由「音聲世界的謠」轉向「文字世界的謠」這一單向過程，而是存在著經由「文字世界的謠」轉向「音聲世界的謠」、再由「音聲世界的謠」轉向「文字世界的謠」這一循環過程的可能性。如後文所引、見於司馬彪（約240–306）《續漢書·五行志》的謠，「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²³ 從這一長段歌詞的謠言也可窺見由「文字世界的謠」轉向「音聲世界的謠」的過程，即重新作詞、進行文字化創作的歌詞被再演繹的可能性。

下文將考察「謠」的預言性。「音聲世界的謠」乃是在某一歷史事件尚未發生之際，因預感而被歌唱者（不可否認，也可能並非如此）。與此相對，「文字世界的謠」大多則是在事件已然發生後，才將「謠」與歷史事件（結果）同時呈現出來。

就此問題，東晋次（Higashi Shinji，1944–2021）在上引串田書書評中指出：「預言的『謠』與事件發生之間的時間先後關係證據並不存在，即上述『謠』有可能是後期創作而再加工的結果」，²⁴ 就「『謠』的發生」→「事態發生」這一構圖提出質疑。

除此之外，後代史家所敘述的「謠」還有可能被牽強附會地與某些歷史事件相聯繫，這一點也十分重要。²⁵ 不過，此處所謂的牽強

22 《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頁179。

23 司馬彪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志十三，〈五行一〉，頁3281–3282。編者按：作者正文中所指《續漢書》皆引自此版。

24 參考東晋次：〈中國における政治批判の傳統的方法——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を讀みて〉，《創文》第421號（2000年），頁20–22。

25 參考上引天鷹、朱自清書，志村論文等。

附會，並非指史家為反映自身史觀而強作曲筆。即使在後世看來未必合理，但在當時或許就是史家對於「歷史事實」的認識。這是很重要的。

《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裴注引王粲《英雄記》記載，「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²⁶ 裴松之認為，雖然童謠皆有其徵兆，但是此處以公孫瓚為對象的童謠卻似並無徵兆。後文則以「蓋」起文，另附裴松之自己的解釋。此處重要的並非是「音聲世界的謠」是否實際蘊含預言性，而是裴松之認識到「謠」（此處為「童謠」）的預言性。

在記錄某一言說（謠、諺、謠言等）之際，對於言說中越是不解的問題，記錄者就越是希望尋得一個根據相應時代的基準而可以判定為合理的答案。此外，如果史家認識到「謠」的預言性，那麼，「音聲世界的謠」越是不可解，越是會在多樣的解釋之中尋求最為合理的回答，即求諸符合史家歷史認識的歷史事件。這大概是因為，那些與史家的歷史認識不相符合的「謠」，因其無用而被忘卻；而史家之間則認可具有整合性的「謠」為原本「謠」所應有之貌，並加以敘述。如果無關乎有意識或無意識，而是出於整合性需求才聯繫相關歷史事件對「謠」加以敘述，那麼，也就不可否認，這可能導致原本流傳的「謠」（「音聲世界的謠」）與敘述的「謠」（「文字世界的謠」）之間發生本質的乖離。

然而，這一可能性並不能使相應時代「謠」的重要性有所削弱。可以說，敘述者認為「謠」具有預言性的認識乃是該時代的歷史特質。當然，可以判斷的是，這一認識並非史家所特有，而是基於當時政治與社會背景而形成、有其時代特徵的認識。

本文之研究，並非據現存「文字世界的謠」去復原本來的「謠」、即「音聲世界的謠」；而是將研究起點置於「音聲世界」的「謠」被蒐集、向「文字世界」發展的時點，即「謠」被敘述的時點。如此，即便「謠」可能是偽造、捏造或誇大解釋之物，研究者也可在其中發現基於相應時代的歷史特質而形成的歷史認識。

²⁶ 《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頁 245。

三、東漢末、三國、西晉時期謠的敘述

關於東漢、三國、西晉時期「文字世界的謠」，本文列出各個時代的「史」類古籍中的描述，並進行概括。²⁷

一、東漢：《東觀漢記》

二、東漢末、三國：王粲《漢末英雄記》（簡稱《英雄記》）、²⁸ 魚豢《魏略》、²⁹ 謝承《後漢書》³⁰

三、西晉：司馬彪《續漢書》、陳壽《三國志》、袁曄《獻帝春秋》、³¹ 虞溥《江表傳》³²

下文對「文字世界的謠」加以考察，並非依據其敘述對象所屬的時代順序，而是依據相關史書編撰的時代順序進行。相關討論不僅限於一般認為的蘊含預言性的「謠」，而是包含歌、語、謠等的謠言全體。

關於東漢末至三國時期謠言的敘述，管見所及，可以確認的有

- 27 關於被視為分析對象的謠言，合諸史書、史注、類書等，參考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杜文瀾輯，周紹良校點：《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尚恆元、彭善俊編：《二十五史謠諺通檢（增訂本）》（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8 關於王粲《英雄記》，參考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三三，〈經籍志〉，頁960，謂「《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
- 29 關於魚豢《魏略》，參考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四六，〈經籍志上〉，頁1989，謂「《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又，關於《魏略》之具體討論，參考津田資久（Tsuda Tomohisa）：〈《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第31期（1998年），頁1-29。
- 30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54，謂「《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 31 關於袁曄《獻帝春秋》，《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57，謂「《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又，《三國志》，卷五七，〈吳書·陸瑁傳〉裴注，頁1337，謂「〔袁〕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 32 關於虞溥《江表傳》，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八二，〈虞溥傳〉，頁2141，云「〔虞〕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關於其成立年代，滿田剛（Mitsuda Takashi）：〈虞溥《江表傳》について〉，《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30號（2018年），頁41-59，推測為公元280年代中期至311年之際。

王粲《英雄記》、魚豢《魏略》、謝承《後漢書》。王粲《英雄記》、魚豢《魏略》對於著者而言，乃是同時代的歷史，而謝承《後漢書》則包括同時代歷史和前朝歷史。

首先，《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英雄記》中有記載「謠歌」云，「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³³ 此處在記載謠言所歌之場所（京師）、歌者（咸言）之後，又記謠言（「河臘叢進」）被採錄，並指出其對應的簡單事件（獻帝臘日生也）。不過，其所引之處吟唱時期不詳，因此難以確定這一敘述是否認定該謠言蘊含預言性。

其二，《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裴注引《英雄記》曰：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

〔公孫〕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³⁴

此處記載的是與漢末群雄之一的公孫瓚有關的「童謠」。文中的「童謠」與《三國志》正文之中記載的公孫瓚與袁紹戰而接連敗北、乃固守易京之事相印證。

根據《英雄記》中的「先是」，可知王粲意識到在事件發生之前，已有吟唱該童謠一事。此後，公孫瓚判斷此童謠所指之地為易，遂決定固守易地。這一事件是按照「童謠」的出現⇒當事者的解釋、判斷⇒歷史事實（結果）這一順序加以敘述而成的。即，此處的「童謠」因蘊含預言性而被敘述。

其三，《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裴注引《英雄記》云：

³³ 《後漢書志》，志十三，〈五行一〉，頁 3284。

³⁴ 《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頁 245。

時有謠言曰：「千里艸，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

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³⁵

上文記載關於董卓的謠言、歌，以及書布之事。這一系列謠言、歌都取材於與董卓有關的內容，卻並未記載董卓本人對於謠言、歌的解釋，僅記錄了董卓之死的歷史事實。根據在董卓死之前已有童謠吟唱，可以判斷王粲將此視為蘊含預言性的「童謠」。

這一謠言也見於同為東漢末編述的應劭《風俗通》。而彼處明確記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一日生。』此董卓之字。青青，暴盛之貌」，³⁶其所吟唱的對象就是董卓。又，《續漢書·五行一》劉昭注引《風俗通》記載：「〔董〕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³⁷可知董卓知曉此歌乃是針對自己所發，故曾禁絕「董逃之歌」。

《英雄記》編者王粲（177–217）曾隨獻帝西遷（公元 190 年），移居長安，為蔡邕賞識而擢用其才。蔡邕對王粲有很高的評價，從作為當時著名藏書家的他將其全部藏書賜給王粲這件事可以看出。³⁸王粲後因長安荒廢而投靠荊州劉表，未獲重用；劉表死後，進言其子劉琮歸順曹操（公元 208 年）；再後侍曹操而展其博識，參與訂立舊儀、確立制度等。

對於年輕時目睹東漢王朝日暮西山、遍嚐辛酸的王粲而言，公孫瓚、董卓等人事都是他切身體感的當代歷史。王粲所體感的東漢

35 同上注，卷六，〈魏書·董卓傳〉，頁 179。

36 參考應劭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442，及王天海、王韜撰：《意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四，頁 424。

37 《後漢書志》，志十三，〈五行一〉，頁 3284。

38 《太平御覽》，卷五一三，〈宗親部三·從伯叔〉，頁 2336，引《博物志》：「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粲子預魏諷反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景，字長緒。」

末年社會，在其〈七哀詩〉中也可以一窺端倪：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³⁹

上詩中記述的光景是，王粲因避長安之亂而行至荊州，沿途之上看見白骨覆蓋平原，飢餓的母親正不得已將自己的孩子拋棄在雜草之間。伊藤正文將王粲〈七哀詩〉的敘述態度，稱為詩歌拒絕使用修辭表現的「記實的態度」。⁴⁰ 雖然王粲多是作為文人而為世人評價，但不可忽略的是他生於亂世的官僚身分。雖然難以確知王粲如何明確界定〈七哀詩〉與《英雄記》的敘述內容，但是可以推測《英雄記》中所採錄的上述「童謠」、「謠言」、「歌」、「謠歌」等，都是王粲所體驗的極為現實的事件之敘述，也可能是王粲曾親耳聆聽過的「音聲世界的謠」。

其四，《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淩傳〉中，嘉平元年（249）記事⁴¹所附裴注引《魏略》云：

〔令狐〕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譎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淩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⁴²

39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二三，〈詩丙·哀傷·七哀詩二首〉，頁1087。

40 參考伊藤正文：〈王粲詩論考〉，《中國文學報》第20卷（1965年），頁28-67。

41 《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淩傳〉，頁758，記載「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

42 《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淩傳〉，頁759。

上文記載齊王芳當政時吟唱的「譎言」與「謠言」。其中，「譎言」的吟唱場所（東郡）雖有記載，文中卻並未對其直接解釋。另一方面，對於「謠言」中所歌「其誰乘者朱虎騎」，據朱虎為楚王彪年幼時之字，大約可以推測這是令狐愚與王淩稱頌曹彪的、蘊含預言性的謠言，文中又對二人決定擁立曹彪之經緯進行了敘述。後文所引《魏略》記事，詳細記述了圖謀擁立楚王彪的王淩與其外甥令狐愚的計畫，最終卻因司馬懿而歸於失敗的經過。此處也是依據謠言的發生、當事者的解釋與判斷、歷史事實（結果）的順序加以敘述。

另一方面，《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玄傳〉裴注引《魏略》云：

〔夏侯〕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⁴³

上文記載職掌監督諸將、選擢武官的護軍之官就任者收受賄賂的習俗，並敘述了當時的謠言是如何吟唱的。據此可知，文中將並不蘊含預言性的謠也作為謠言進行記錄。

筆者最後將考察謝承《後漢書》。《北堂書鈔》卷七六〈設官部二八·太守下一六六〉引謝承《後漢書》，「黃昌為蜀郡太守，未至蜀郡，時有謠曰『兩日出天兮』」，⁴⁴是徑直吟頌蜀郡太守黃昌之謠。管見所及，現存謝承《後漢書》佚文之中，除此謠外，並無其他的謠，也沒有蘊含預言性的歌謠記載，而多見以歌、號、語為中心，對批判或稱讚對象作徑直解讀的記載。無庸置疑，此史料與《東觀漢記》同樣呈現出東漢史敘述的傾向。

43 同上注，卷九，〈魏書·夏侯玄傳〉，頁 299-300。

44 虞世南撰：《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卷七六，頁 331。

上文關於三國時期「謠」的敘述，雖因現存之例極少而無法斷言，但可以確認的是，「謠」、「謠言」、「童謠」、「謔言」等，有混用狀況。而關於它們的敘述形式，則混雜著或不記歌者而對吟唱場所明確記錄、或對場所也不加記載之例。當然，因為書寫的差異，僅據這一事實無法斷言其具體形式。然而可以指出的是，在「音聲世界的謠」向「文字世界的謠」轉換之際，尚未形成固定的敘述形式。因此，對於「謠」、「謠言」、「童謠」、「謔言」等混用的現象，須詳加檢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很難想像：歌者在吟唱謠時曾對其究竟是「謠」抑或「童謠」先加以區分、再行演繹。而在謠向「文字世界」發展之際，則可根據記錄者或敘述者的意圖而分為「謠」、「謠言」、「童謠」、「謔言」等，並加以敘述。即便這是無意識的行為，也可以對其歷史背景進行解讀。

是以，下文將考察西晉時期成書的陳壽《三國志》正文中所採錄的「謠」。《三國志》中共採錄3首謠言，其特徵是都記錄作「童謠」，且僅見於《三國志·吳書》。

《三國志》卷四七記載，吳主孫權時期：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⁴⁵

此處記載，黃龍元年（229）春，公卿百司勸諫孫權即皇帝位，是年夏，現符瑞之黃龍、鳳凰，孫權遂受此兆而即位。其後，文中記錄了暗示此事的「童謠」，在東漢獻帝興平（194–195）年間曾在吳中地區廣為吟唱。由此，聽者深為銘記：孫權即位皇帝乃勢所必然。另一方面則需要注意，這是東漢王朝之凶兆。這一敘述乃是因敘述者立場有別，而產生大相徑庭的理解、解釋的絕好例證。文中亦明確指出了謳歌「童謠」的時期與場所。

45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權〉，頁1134。

又，《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中記載：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箴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

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箴束其腰，投之於此岡。⁴⁶

上文記載了與孫吳諸葛恪相關的謠。所謂「成子閣」為反語，指石子岡；而石子岡則是建業之南丘陵之地，葬死者之所。如此處「先是」所示，可知該童謠是在諸葛恪死前所歌者；而諸葛恪探尋石子岡，可理解為暗示諸葛恪之死的預言。然而，此處關於吟唱場所、歌唱者身分等記述均付之闕如。

最後則是《三國志》卷六一〈吳書·陸凱傳〉：

〔孫〕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⁴⁷

上文記載陸凱對於孫皓遷都武昌之事，援用「童謠」予以諫言。雖然無從判明該童謠究竟出自韋昭《吳書》抑或陳壽所述，但是至少可確認其是陳壽最終所述的「童謠」。由此可知，《三國志》中所錄

46 同上注，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頁1441。

47 同上注，卷六一，〈吳書·陸凱傳〉，頁1400-1401。

謠皆記作「童謠」。⁴⁸

為何以「童謠」的形式進行敘述？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童謠」之後陸凱的發言。陸凱在「童謠」之後，謂「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此處將熒惑（火星）與「童謠」進行聯繫，認為「童謠之言」是生於天心者。⁴⁹ 正因如此，上文對於「童謠」的歌者、場所、時期等不作明記而加以利用。換言之，這讓人深為銘記：童謠遠離吟唱人民疾苦，而升華至表明天心之存在。

又，將謠言與熒惑相聯繫而作為「童謠」進入歷史敘述，使「童謠」呈現出所具有的、難以抗拒的天之力量，其效果是令讀者對「童謠」及其相聯繫的歷史事件之必然性深為觸動。

又，關於這一時期諸種謠言被作為「童謠」而加以敘述之事，《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裴注引袁曄《獻帝春秋》云：

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
〔董〕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⁵⁰

上文記載，原本吟唱獻帝的謠在袁曄《獻帝春秋》中被作為「童謠」

48 考察《三國志》中「謠」的敘述時需要注意的是，其所錄「謠」皆集中於「吳志」。其原因在於，如前賢所論，《三國志》「吳志」多據三國吳的韋昭所撰之《吳書》。因而，無從判明這些「童謠」究竟出自韋昭《吳書》抑或陳壽。但是，在三國末至西晉的歷史敘述之中，「童謠」與熒惑的結合至關重要。關於《吳書》的討論，參考滿田剛：〈韋昭《吳書》について〉，《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16號（2004年），頁235-285。

49 上引申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第五章「『童謠』と熒惑」中，謂「童謠」與熒惑結合的最早記錄見於王充《論衡》。該書頁213，記載在東漢滅亡之後，「童謠」轉變為「為告誡天之神諭而受差遣、降臨地界的熒惑之精的童子吟唱的內容，即轉化為天意的代言」。又，關於熒惑，《晉書·天文志》，頁320，記載「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知熒惑（火星）下落地上化作童子，唱歌跳舞，呈現出吉凶之兆。可以推測西晉時期「童謠」的記載，或許是由於意識到「謠」與熒惑的關聯，其預言性為天意而非人為之故。而〈天文志〉之記事究竟何時所書，並不能確定，故而未作斷言。

50 《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頁173。

記載。此處所敘述的也是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已有「童謠」吟唱，之後再敘述其所對應的事件。此外，《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皓〉裴注引《江表傳》云：

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孫]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⁵¹

丹楊人刁玄於壽春使魏降虜吟唱「吳天子當上」的謠言，虞溥記此作「童謠」。然而如史籍所記載，該謠言所歌之預言並未應驗。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虞溥明確表明，作者已確知這一謠言為刁玄之偽作而仍以「童謠」的形式進行記載。那麼，何以虞溥明知其為偽作卻要對事關國家興亡的「童謠」加以記載？這大概是敘述者對「童謠」所具備的政治與社會效力反其道而用之的敘述策略。換言之，其敘述旨在區分：賢明天子能夠明辨表現上天意志的真「童謠」而付諸行動，但昏庸的孫皓則盲信偽造的「童謠」而貿然採取行動。可以推知這一敘述藉助「童謠」的記載，暗示其與國家存亡息息相關，而昏庸的孫皓最終必然亡國，讀來令人印象深刻。這一敘述手法的行之有效，表明「音聲世界的謠」所具備的社會性影響力。

又《太平御覽》卷一五六〈州郡部二·敘京都下〉引《江表傳》云：

孫皓欲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浚流供給，以為患。陸凱

51 同上注，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皓〉，頁1168。

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武昌土地，危險礪确，非王者都安國養民之處，舡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昌居。』臣聞翼星為祥，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發自天心也。」⁵²

上文列舉與前引《三國志》卷六一〈吳書·陸凱傳〉大致相同的內容。此處也證明《江表傳》認為，「童謠」的敘述蘊含天意。

綜上考察表明，雖然作為檢討對象的謠言敘述用例甚少，但是東漢末至三國、西晉時期十分重視作為敘述對象的「音聲世界的謠」，將其作為相關事件發生之前所歌的、包含預言性的存在而加以敘述。

如前引應劭《漢官儀》中「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所云，謠言原本就被視為一種強調民眾疾苦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對執政者而言，謠言則是獲悉民眾疾苦現狀的重要途徑。然而，正如《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所見，東漢末時的社會，因採納謠言的機制漸趨麻痺，人們遂選擇作為表明天意所在的「童謠」並對其概念化，用來作為敘述「音聲世界的謠」的用語。

四、司馬彪《續漢書》中謠的敘述——〈五行志〉的框架

眾所周知，司馬彪《續漢書》本紀列傳部分已散佚，今日所見僅為南朝梁劉昭合諸范曄《後漢書》中的八志。其中，謠為八志之〈五行志〉所採錄。《續漢書·五行志》序云：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
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

⁵² 《太平御覽》，卷一五六，〈州郡部二·敘京都下〉，頁758。

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⁵³

據此，可知其敘述立場沿襲《漢書·五行志》。此外，從這份史料中還可以看出，司馬彪對於東漢時期的災異記錄，參考了應劭、董巴、譙周等人的先行敘述。

又，司馬彪編撰《續漢書》之際，實際無從親耳聆聽「音聲世界的謠」。即，司馬彪在編撰《續漢書》，敘述東漢史時，乃是基於「文字世界的謠」重構東漢時代所記載的謠言。雖然這確定無疑、實無再指出的必要，但是對本文的研究視角十分重要。

司馬彪在《續漢書·五行志》中，共記錄王莽時期至東漢初期 3 首、順帝末期 1 首、桓帝初期 3 首、桓帝末期 2 首、靈帝末期 2 首、獻帝時期 2 首，合計 13 首「童謠」。首先形式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記載的謠全部記作「童謠」。如下文所詳述，《英雄記》與《風俗通》等記作「謠言」者，此處全部統一作「童謠」。又，《續漢書·五行志》中所見的，多為桓帝以降的「童謠」。而司馬彪認為係順帝末期都城中所傳唱的一首童謠，應劭《風俗通》則判定是桓帝時期的謠言；由此，13 首之中，有 10 首可斷定為桓帝以後的「童謠」。

再者，其敘述方法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其敘述方法之一，見於王莽時期至東漢初期的 3 首：⁵⁴

表 2 童謠所歌時期 + 場所 + 童謠 + (是時 / 時) 歷史事象

<p>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p> <p>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p>
<p>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p> <p>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p>

⁵³ 《後漢書志》，頁 3265。

⁵⁴ 同上注，志十三，〈五行一〉，頁 3280-3281。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上述相關 3 首，在點明童謠所歌時期、場所之後，再引出童謠。此後再列出作為關聯事項的、童謠所歌時期的相關事件。

另一敘述方法，見於順帝以後的童謠，如：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蠹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⁵⁵

則是童謠所歌時期 + 場所 + 童謠 + 「案」(司馬彪的解釋、關連事件) 的行文順序。這一按語，乃是窺知司馬彪敘述意圖的重要線索。此處將其吟唱時期定為順帝末期，而這一謠也見於東漢末應劭的《風俗通》：

桓帝世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梁冀欲樹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於獄中，曝屍路邊。如鉤梁冀，如弦李固。⁵⁶

如前文所述，應劭所認為「桓帝世」的「謠言」，司馬彪則視為「順帝末」的「童謠」，並明確記錄了吟唱場所，二者顯然有別。此外，應劭以梁冀與李固之事解釋這一謠言內容，而司馬彪的解釋則更加

⁵⁵ 同上注，頁 3281。

⁵⁶ 《意林校釋》，卷四，頁 423。

複雜。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應劭《風俗通》以此為「謠言」，而這一敘述與該謠言所歌時代的解釋截然不同。對於「音聲世界的謠」的不同解釋，使得窺知史家的歷史認識——他們如何解釋謠言，以及如何將其與歷史事實相匹配——成為可能。考慮到相關史家的認識，或多或少受其所生存時代的影響；那麼，史家在敘述「音聲世界的謠」時，具體關聯至甚麼歷史事實並如何解釋，就彰顯了該時代的特徵。

因此，為探討司馬彪將各類謠言統一為「童謠」敘述之用意，下文將對《續漢書·五行志》全篇進行考察。首先，就其結構，相比《漢書·五行志》始於《尚書·洪範》篇「九疇第一」中所引五行，司馬彪《續漢書·五行一》則起筆於《尚書·洪範》篇「九疇第二」所引五事之貌：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荊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荊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荊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

遂誅滅。⁵⁷

此處記載，共立劉盆子的赤眉頭目們行事混亂無律，唯有大司農楊音與眾不同，因此在赤眉為光武帝擊敗之後，他得以保全天壽；又記光武帝駕崩後，明帝異母兄弟山陽王劉荆未盡哀悼之情，遂致末路；又記章帝時得勢的外戚竇憲，在章帝歿後被誅殺之事。其後直至順帝時事，則闕如不記。再後，對於桓帝時權勢喧天、為所欲為的梁冀兄弟，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先記百姓之「號」，而後記梁氏兄弟被誅殺之事。

《續漢書·五行志》中的上述敘述，對於知曉東漢歷史的人而言，大概並無不恰當內容。然而綜觀〈五行志〉，則在光武帝、明帝、章帝之後僅取桓帝時事，未免彼此失衡太甚。

又，《續漢書·五行志》之中的災異記事，除去謠之外，光武帝時期 3 件，明帝時期 1 件，章帝時期 4 件，和帝時期 20 件（有相關關連事件敘述者 17），殤帝時期 3 件，安帝時期 85 件（有相關關連事件敘述者 17），順帝時期 24 件（有相關關連事件敘述者 16），沖帝時期 1 件，質帝時期 1 件，桓帝時期 58 件（有相關關連事件與解釋敘述者 30），靈帝時期 75 件（有相關關連事件敘述者 33），獻帝時期 23 件（有相關關連事件敘述者 10）。災異記事自和帝以降急速增加，至安帝時期即達 85 件之多。此後靈帝、桓帝續之。

又，關於災異記事，除去僅就相關現象的發生事實進行繫年的記錄之外，還需注意有就相關現象加以解釋、一併附記相關事件的記錄。此處舉《續漢書·五行志》地震條中一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⁵⁸

⁵⁷ 《後漢書志》，志十三，〈五行一〉，頁 3268–3269。

⁵⁸ 同上注，志十六，〈五行四〉，頁 3331。

桓帝建和元年（147）四月與九月，都城發生地震。這一災異記事之後，又記「是時」，即與地震並起之時，梁太后執政，太后兄梁冀掌權。此後，和平元年（150）太后崩後，梁冀專權，至熹平二年（159）乃為誅殺。雖然文中就兩起地震與梁太后攝政、及梁冀專權如何相連，並未說明；但是，該敘述安排使得讀者傾向於將兩者加以關聯。這一敘述傾向，在和帝以後變得十分顯著。桓帝時發生的災異記事 58 件，相對應的關連事項與解釋多達 30 件，而其中 17 件是與梁太后與梁冀兄弟相關的內容。

下文將進一步考察繫屬於桓帝時期的 5 首「童謠」。5 首之中，有 3 首繫屬桓帝初期。⁵⁹

表 3 桓帝初期的 3 首童謠

<p>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嚙胡。」</p> <p>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p>
<p>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p> <p>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閒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閒迎靈帝也。河閒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春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p>
<p>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p> <p>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寶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p>

關於此處 3 首童謠，司馬彪皆有按語加以說明。第 1 首按語係元嘉年間（151–152）之羌亂。因無法弄清童謠所歌時期與叛亂時期

59 同上注，志十三，〈五行一〉，頁 3281–3283。

的前後關係，因此難以斷言其是否蘊含預言性。而據「不敢公言，私咽語」的解釋，可知司馬彪認為該童謠是針對實際發生的羌亂所歌者。所錄第 2 首「童謠」篇幅非常長，後附解釋認為其內容是表現政治之貪欲。具體而言，將該童謠與此後桓帝死、靈帝即位，靈帝與其母永樂太后（河閒姪女）以賣官中飽私囊的事件相關連。第 3 首則聯繫至桓帝晚年、延熹末年間，皇后竇貴人之父竇武，在靈帝時期竇太后攝政時，與陳蕃攜手推行公平擢用官吏之政，遂結束豪族、名門壟斷官職的事件。下文列舉〈五行志〉中所見桓帝初期（建和年間）所發生的 9 件災異記事。⁶⁰

表 4 桓帝初期（建和年間）災異記事⁶¹

年號	公曆	災異分類	關連事件有無	災異及關連事件
建和元年	147	地震	○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 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五行四·地震〉，頁 3331）
建和元年	147	山崩	○ ◎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 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五行四·山崩〉，頁 3333-3334）
建和二年	148	災火	○ ◎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 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五行二·災火〉，頁 3295）
建和二年	148	大水 水變色	○ ◎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 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五行三·大水 水變色〉，頁 3311）

60 關於災異記事，另請參考佐藤武敏（Sato Taketoshi）：《中國災害史年表》（東京：國書刊行會，1993 年）。

61 表中引文據司馬彪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皆不出腳注，來源附於引文後。表中標記含義：○關於梁太后、梁冀專權相關敘述 ◎關於梁冀與李固、杜喬相關敘述

年號	公曆	災異分類	關連事件有無	災異及關連事件
建和三年	149	大水 水變色	○	〔建和〕三年八月，京都大水。 是時梁太后猶專政。（〈五行三·大水 水變色〉，頁 3311）
建和三年	149	山崩		〔建和〕三年，郡國五山崩。（〈五行四·山崩〉，頁 3334）
建和三年	149	冬雷	○ ◎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 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五行三·冬雷〉，頁 3316）
建和三年	149	羊禍	○ ◎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 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五行二·羊禍〉，頁 3302）
建和三年	149	地震		〔建和〕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五行四·地震〉，頁 3331）

上表所及 9 件災異記事，有 7 件與梁太后攝政與梁冀專暴、建和元年（147）十一月李固、杜喬被殺，以及梁氏滅亡等事件相關，此結果與前揭上引〈五行志〉序中所云「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⁶² 的見解，可謂異曲同工。

又，〈五行志〉在預言竇武以公平擢用官吏的童謠之後，記載了桓帝末期的兩首「童謠」。⁶³

62 《後漢書志》，志十三，〈五行一〉，頁 3269。

63 同上注，頁 3283–3284。

表 5 桓帝末期的 2 首童謠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

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詠、尚書柳分、尋穆、史佚、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傳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閒來合諧，河閒來合諧！」

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閒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閒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開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第 1 首記載「童謠」所歌桓帝末期黨錮之禁的實情，後附預言靈帝時期整肅陳蕃、竇武之事。這一敘述否定了此前所記「童謠」預言的，桓帝初期陳蕃、竇武到來令人愉悅的情況，實際突顯出兩人被整肅的結果。第 2 首則記載「童謠」預言靈帝即位、宦官亂政。

《續漢書·五行志》所錄桓帝時期的 13 首童謠，接下來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其中 5 首。其吟唱之地明確記載為天下或京都，顯示出該童謠對當時社會所具重大的影響力。另，桓帝時期非常值得關注的災異記事，也見於〈五行五·龍蛇孽〉。其中，桓帝延熹七年（164）「龍」的記事記載：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

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⁶⁴ 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⁶⁵

司馬彪認為，在此處龍死的記載中，龍乃是帝王出現之瑞兆，於是將其聯繫至天鳳年中於黃山宮發現死龍一事及漢之中興；又進一步聯繫至「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即漢魏王朝交替。

這裡有幾個內容需要注意。其一，把原本作為祥瑞的「龍」放在「孽」的範疇中加以敘述。其二，將死龍的出現定位為漢魏交替之兆。以上兩點對司馬彪所建構的東漢史敘述意義重大。以死龍出現作為王朝交替之兆，然而桓帝延熹七年實則並無魏興起之預兆。因此，漢魏交替的解釋必是司馬彪的判斷。這或許是司馬彪編撰《續漢書》的西晉時期之既有認識，但是本文想強調的是，司馬彪最終選擇並記述了這一解釋。

一般認為是吉兆的龍被置於〈五行志〉中「孽」這一範疇，這一敘述可據《漢書·五行志下之上》確認。龍蛇之孽乃是君主不君之際所生之災異，「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⁶⁶ 龍蛇之孽，除去桓帝時的死龍事例以外，相關記錄還有安帝延光三年（124）的黃龍、四年（125）的黃龍二條，桓帝永康元年（167）的黃龍，以及靈帝熹平元年（172）的青蛇幾則。

「孽」為動物所致變異，於《續漢書·五行志》之中，最早見於安帝延光三年之記事。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

64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九九中，〈王莽傳〉，頁4139，記載「〔天鳳二年（15）〕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引作龍死之訛言。又《後漢書》，卷三〇下，〈襄楷傳〉，頁1076-1079，作「延熹九年（166），楷自家詣闕上疏曰……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並無「此易代之徵也」之語。

65 《後漢書志》，志十七，〈五行五〉，頁3344。

66 《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頁1458。

月，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愆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⁶⁷

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⁶⁸

關於鳳凰，上文先引一說謂，無明主則鳳凰不顯現，又謂五色大鳥而與鳳凰相似者，多為羽蟲之孽。其後羅列安帝輕信了中常侍樊豐等人的讒言，罷免太尉楊震、廢立太子之事，謂其乃是「不愆之異」。「不愆」一辭，據《續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謂「視之不明，是謂不愆」。⁶⁹ 據同文所引劉昭注，「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⁷⁰ 是指君主清楚地洞悉事物之義。即此處強調，安帝為不明之君，故其統治期間並無鳳凰顯現之符瑞。綜上所述，司馬彪認為，即便是在眾多符瑞出現的章帝時期，⁷¹ 鳳凰的出現也屬於孽的範疇。此外，《續漢書·五行志》中另有記載安帝延光三年（124）羽蟲孽 1 則，桓帝元嘉元年（151）羽蟲孽 1 則，靈帝光和四年（181）羽蟲孽 1 則，中平三年（186）羽蟲孽 1 則。

67 司馬彪注意到，章帝死後，記錄者不以鳳凰出現為符瑞，而以其為章帝駕崩之兆，即孽。這對於記錄符瑞的過程而言，頗具意義。

68 《後漢書志》，志十四，〈五行二〉，頁 3300。

69 同上注，頁 3291。

70 同上注，頁 3292。

71 《藝文類聚》，卷九八，〈祥瑞部上·祥瑞〉，頁 1694，引《東觀漢記》，「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鷺、白鵠、甘露、嘉瓜、秬稬、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關於此處章帝、安帝時期出現鳳凰一事，《藝文類聚》卷九九〈祥瑞部下·鳳皇〉引《東觀漢記》文，謂「章帝時，鳳皇百三十九見，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⁷²皆以為符瑞。⁷³原本，龍與鳳凰在建初四年（79）章帝臨席召開白虎觀會議時，就被視為符瑞。⁷⁴白虎觀會議的會議記錄、班固所編集《白虎通》⁷⁵卷六〈封禪〉中記載：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⁷⁶

符瑞乃是感應王者之德所出現之物，一般認為如果皇帝之德至於鳥獸，則鳳凰顯現（德至鳥獸則鳳皇翔）；德至於淵泉，則黃龍出現（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這表明東漢時期將龍與鳳凰的出現理解與敘述為符瑞之象。串田認為，「祥瑞如果是正向的『預言』，那麼，災異則是負向的『預言』」。⁷⁷然而，司馬彪於《續漢書》八志之中並未視其為吉兆的符瑞，而是將東漢時期視為符瑞的現象盡數置於「孽」的範疇加以理解與敘述。這一認識，實則與西晉時期的一般理

72 《藝文類聚》，卷九九，〈祥瑞部下·鳳皇〉，頁1708-1709。

73 永田拓治（Nagata Takuji）：〈漢晉期における符瑞の敘述と王朝史編纂——「志」という敘述の枠組み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83卷第4號（2025年），頁1-33。

74 又關於孽，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六，〈災變〉，頁270，謂「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大傳》云：『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未列舉龍、鳳凰等。

75 關於《白虎通》，參考日原利国（Hihara Toshikuni）：〈《白虎通義》研究緒論——とくに礼制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氏著：《漢代思想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6年），頁262-294。池田秀三（Ikeda Shuzo）：〈白虎通義と後漢の學術〉，收入小南一郎（Kominami Ichiro）編：《中國古代禮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年），頁267-312。渡邊義浩（Watanabe Yoshihiro）：〈後漢儒教の固有性——《白虎通》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渡邊義浩編：《兩漢の儒教と政治權力》（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頁125-147。

76 《白虎通疏證》，卷六，〈封禪〉，頁283。

77 上引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頁223。

解不盡相符。符瑞即便在西晉時期也還是被記於起居注等文獻，而《續漢書》中所採取的敘述立場極為特別。

雖然這一符瑞立場極其罕見，然而也見於陳壽《三國志·魏書》中，尤其與漢魏禪讓之際、記載大量符瑞的《魏略》大相徑庭。換言之，可以料想這一敘述立場的形成，與西晉這一時代因素的背景密切相關。泰始三年（267）朝廷曾禁止星氣、讖緯之學，⁷⁸ 此可作為理解這一背景記載的重要依據。⁷⁹ 「星氣」指占星術，「讖緯」指預言相關之讖語與旨在解釋經書之緯文，在東漢時期曾對朝野均有重大影響。⁸⁰ 東漢以降，曾對朝野影響甚鉅的星氣、讖緯之學遭到禁止；不難想像，其背景之中，⁸¹ 就有在轉瞬即逝的時間之內所發生的、通過禪讓完成的兩次王朝更替。⁸² 這裡省略其詳，《三國志·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中，就有漢魏禪讓之際，對魏國充分利用符瑞出現與讖緯書籍作理論武裝的細緻描寫。可以推測，對於效法漢魏禪讓的魏晉禪讓，讖緯思想也必定發揮了重要作用。⁸³ 但是，《三國志》中，與漢魏禪讓、魏晉禪讓相關的〈文帝紀〉、〈三少帝紀·陳留王曹奂〉等記載中，全無關於讖緯的敘述。這是因為，預言王朝交替的符瑞與讖緯思想是極其不適宜的存在。為防止禪讓的再次發生，就必須斷絕作為其根據的符瑞與讖緯及其相關聯事件的

78 《晉書》，卷三，〈武帝紀〉，泰始三年十二月條「禁星氣讖緯之學」，頁 56。

79 關於武帝禁止讖緯之學及其相關敘述的關係，參考永田拓治：〈漢晉期における仏教流傳と歴史敘述〉，《立命館東洋史學》第 44 號（2021 年），頁 85-120。

80 三浦雄城（Miura Yuki）：〈後漢官学における讖緯と章句〉，《中國：社會と文化》第 35 號（2020 年），頁 99-114。三浦雄城認為，縱貫東漢一代，包括讖緯在內的官學章句在太學傳授學習，因而，讖緯的解釋得以持續繼承。

81 川原秀城（Kawahara Hideki）：《中国の科学思想》（東京：創文社，1996 年），頁 28，認為星氣與讖緯之學，乃是權力不可或缺的學術，同時也是官方極富危險的存在。

82 參考宮川尚志（Miyakawa Hisayuki）：《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會篇》（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56 年），第二章「禪讓による王朝革命の研究」，頁 73-172。

83 關於漢魏禪讓時的讖緯思想，平秀道（Taira Hidemichi）：〈魏の文帝と凶讖〉，《龍谷大学論集》第 404 號（1974 年），頁 104-116，論之甚詳。小林春樹（Kobayashi Haruki）：〈三国時代の正統理論について〉，《東洋研究》第 139 卷（2001 年），頁 57-83，指出以五行相生說與讖緯思想為禪讓理論的根據，消滅了恆久的天命這一概念，揭示出王朝壽命的必然。

敘述。即，由符瑞敘述這一立場出發，與記載眾多符瑞的《東觀漢記》相比，司馬彪的《續漢書》顯示出大為不同的西晉式的東漢歷史形象。⁸⁴

就謠言敘述之事而言，與上述符瑞的情況相同。串田認為，漢代乃是將種種「謠」匯總為「童謠」的時期。⁸⁵ 而如上所論，以「文字世界的謠」的視點觀之，儘管需要考慮佚文的史料特徵，但是必須留意到《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中皆無「童謠」的相關記錄。以現在殘存「文字世界的謠」視之，可得出結論：作為一種敘述行為，「音聲世界的謠」被表記為「童謠」形式而加以概括，其形成時期是三國時期，其概念的確立則在西晉時期，尤其以司馬彪《續漢書》為代表。

五、結論

就東漢、三國、西晉時期的謠的敘述行為變遷所見，其中較為明確者，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其一，作為採納民意措施的謠言，其機能在東漢末期已經不全；這一狀況對於此後謠言的敘述行為影響深遠。在東漢末、三國時期的敘述中，謠言的出現雖蘊含預言性，但尚未立即確立敘述規範。「音聲世界的謠」在作為文字記錄之際，以「謠言」、「謠」、「童謠」等用語表記。在這一時期的謠言敘述之中，發生了一個值得矚目的變化。即，原本是代表民意而被概念化的「音聲世界的謠」，與彰顯天意的「童謠」相結合。這一變化乃是東漢末以降政治、社會的結構變動所致。從而，原本的「音聲世界的謠」作為「童謠」而進入史書敘述體裁，並在西晉時期司馬彪所編撰的《續漢書·五行志》中得以確立。

另一方面，這一變化導致了「音聲世界的謠」與「文字世界的

84 上引永田拓治：〈漢晉期における符瑞の敘述と王朝史編纂——「志」という敘述の枠組みを中心に〉。

85 上引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頁 206。

謠」之間的相互乖離。原本是針對東漢社會的地方官政績進行評價的「音聲世界的謠」，在《東觀漢記》的記載中，成為明確記錄其歌者、場所與時期的「歌」。而相關「歌」的記錄在《續漢書》之中卻全無蹤影。《續漢書》中未予記錄作為地方官評價指標的謠言，而是在以蘊含預言性的「謠」為中心的〈五行志〉這一框架中記載、敘述其為「童謠」。這一謠言敘述行為的變化，對於東漢史的構建影響深遠。這是本文所欲闡明的第二點。

司馬彪將東漢時代所歌「音聲世界的謠」理解作「文字世界的謠」，並嘗試進行重構，其成果即是《續漢書·五行志》。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中所見東漢的，乃是以東漢王朝滅亡這一歷史事實為前提而進行重構的。司馬彪將桓帝時期定為東漢王朝興衰的分界，並賦予「童謠」以預言屬性，據此展開歷史敘述。整部〈五行志〉中，遍布著認識到桓帝以降之衰亡的災異現象的相關敘述。

儘管如此，這一歷史形象並非司馬彪獨創，可以說早在應劭《風俗通》與王粲《英雄記》等東漢人士所作的當代史敘述中就已初見端倪。然而，這一東漢時期的歷史形象呈現，在東漢一代的各個階段並不相同。雖然這種差異合乎情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作為同時代史書的《東觀漢記》中，卻並無以滅亡為前提的歷史敘述。《東觀漢記》中所描繪的東漢歷史形象，與此後的東漢歷史肖像、特別是曾目睹東漢滅亡的人士眼中的東漢歷史肖像之間，產生齟齬是無可避免的。就此含義而言，東漢末、三國、西晉時期所產生的東漢歷史肖像，正可謂當時時代所造成的歷史肖像。⁸⁶而在這一歷史肖像的構築中不可或缺的，乃是謠言的敘述；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中所呈現的東漢歷史肖像，可以視為這一歷史背景之下的產物。因此，在以范曄《後漢書》與司馬彪《續漢書》為基本史料重構東漢歷史肖像之際，這是不可忽略的一點。

最後作為補充說明：本文並非意在否定東漢之際、桓帝以降時期蘊含預言性的「音聲世界的謠」的大量出現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影

86 《白虎通疏證》，卷六，〈封禪〉，頁 283。

響力。相反，東漢時期所出現的「音聲世界的謠」其存在本身，正是彰顯東漢社會特質的歷史表徵之一。而本文所特別強調的，乃是東漢社會中所歌「音聲世界的謠」，並非原封不動地發展至「文字世界的謠」；這些謠言在傳唱過程中喪失了原有的聲音，而僅以其歌詞與解釋付諸文字被加以記錄。作為文字記錄的謠言，在東漢末、三國、西晉時期的史書編纂過程中被賦予了嶄新的功能。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十三經注疏》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歷史學報》第10期（1982年），頁19-52。
- 王天海、王韜撰：《意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天鷹：《中國古代歌謠散論》。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 司馬彪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朱自清：《中國歌謠》。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 呂宗力：《漢代的謠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杜文瀾輯，周紹良校點：《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李傳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歌謠風議與官民互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132-136。
- 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尚恆元、彭善俊編：《二十五史謠諺通檢（增訂本）》。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胡守為：〈「舉謠言」與東漢吏政〉。《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頁64-69。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馬新：〈時政謠諺與兩漢民眾參與意識〉。《齊魯學刊》2001年第6期，頁82-88。
-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虞世南撰：《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
- 雷群明：〈一份應該重視的遺產——中國古代童謠試論〉。《瀋陽師範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3期，頁108-113。
-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應劭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外文書目

- 東晋次 (Higashi Shinji)：〈中國における政治批判の傳統的方法——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を讀みて〉。《創文》第421號（2000年），頁20-22。
- 日原利国 (Hihara Toshikuni)：〈《白虎通義》研究緒論——とくに礼制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氏著：《漢代思想の研究》，頁262-294。東京：研文出版，1986年。
- 池田秀三 (Ikeda Shuzo)：〈白虎通義と後漢の學術〉。收入小南一郎 (Kominami Ichiro) 編：《中國古代禮制研究》，頁267-312。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年。
- 伊藤正文 (Ito Masafumi)：〈王粲詩論考〉。《中國文學報》第20卷（1965年），頁28-67。
- 狩野雄 (Kano Yu)：〈歌謠としての古樂府——歌われた「場」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文化》第60卷第3、4號（1997年），頁193-211。
- 川原秀城 (Kawahara Hideki)：《中国の科学思想》。東京：創文社，1996年。

- 小林春樹 (Kobayashi Haruki) : 〈三国時代の正統理論について〉。
《東洋研究》第 139 卷 (2001 年) , 頁 57-83 。
- 串田久治 (Kushida Hisaharu) : 《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
東京 : 創文社 , 1999 年 。
- 増田清秀 (Masuda Kiyohide) : 《樂府の歴史的研究》。東京 : 創文社 , 1975 年 。
- 満田剛 (Mitsuda Takashi) : 〈韋昭《呉書》について〉。《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 16 號 (2004 年) , 頁 235-285 。
- : 〈虞溥《江表傳》について〉。《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 30 號 (2018 年) , 頁 41-59 。
- 三浦雄城 (Miura Yuki) : 〈後漢官学における讖緯と章句〉。《中國 : 社會と文化》第 35 號 (2020 年) , 頁 99-114 。
- 宮川尚志 (Miyakawa Hisayuki) : 《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會篇》。東京 : 日本學術振興會 , 1956 年 。
- 永田拓治 (Nagata Takuji) : 〈漢晉期における符瑞の敘述と王朝史編纂——「志」という敘述の枠組み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 83 卷第 4 號 (2025 年) , 頁 1-33 。
- : 〈漢晉期における仏教流傳と歴史敘述〉。《立命館東洋史學》第 44 號 (2021 年) , 頁 85-120 。
- 岡田和一郎 (Okada Yasuichiro) 、永田拓治編 : 《漢とは何か》。東京 : 東方書店 , 2022 年 。
- 大黒俊二 (Ooguro Shunji) : 《声と文字》。東京 : 岩波書店 , 2010 年 。
- 酒井紀美 (Sakai Kimi) : 《中世のうわさ : 情報伝達のしくみ》。東京 : 吉川弘文館 , 1997 年 。
- 佐藤武敏 (Sato Taketoshi) : 《中國災害史年表》。東京 : 國書刊行會 , 1993 年 。
- 志村良治 (Shimura Ryoji) : 〈災異の歌謠〉。收入氏著 : 《中國詩論集 (志村良治博士著作集 I) 》 , 頁 73-88 。
- 東京 : 汲古書院 , 1986 年 。

- 多賀浪砂 (Taga Namisa) : 〈干寶《搜神記》と《漢書》《晉書》五行志〉。《九州中國學會報》第 23 卷 (1981 年) , 頁 26–36。
- 平秀道 (Taira Hidemichi) : 〈魏の文帝と凶緯〉。《龍谷大学論集》第 404 號 (1974 年) , 104–116 頁。
- 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 : 〈拆字考〉。收入江口一久 (Eguchi Kazuhisa) 編 : 《ことば遊びの民族誌》, 頁 193–201。東京 : 大修館書店, 1990 年。
- 瀧遼一 (Taki Ryoichi) : 〈三國時代の歌謠についての私見〉。《東方學報》(東京) 第 11 冊之 3 (1940 年) , 頁 153–182。
- 津田資久 (Tsuda Tomohisa) : 〈《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第 31 期 (1998 年) , 頁 1–29。
- Walter J. Ong 著, 桜井直文 (Sakurai Naofumi) 、林正寛、糟谷啓介 (Kasuya Keisuke) 譯 : 《声の文化と文字の文化》。東京 : 藤原書店, 1991 年。
- 渡邊義浩 (Watanabe Yoshihiro) : 〈後漢儒教の固有性 ——《白虎通》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渡邊義浩編 : 《兩漢の儒教と政治権力》, 頁 125–147。東京 : 汲古書院, 2005 年。
- 柳瀬喜代志 (Yanase Kiyoshi) : 〈童謠考 —— 搜神記「由拳陷沒爲湖」話をめぐって〉。《中國詩文論叢》第 5 集 (1986 年) , 頁 137–148。

***Yao* 謠 Narratives during the Eastern Han, Three Kingdoms, and Western Jin Periods**

NAGATA Takuji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nan University

In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yao* 謠 has been used as a medium for narrating history. The term *yao* refers to songs performed without instrumental accompaniment. Generally speaking, *yao*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one that is used as means to point out the good and bad deeds of government, openly praising and criticizing its deeds, and another that embodies a prophetic nature. Both types of *yao* conveyed public sentiments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by the ruling dynasties and thu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roughout history. While some *yao* sometimes sharply criticized the ruling powers, their anonymit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be suppresse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oint of transition from oral transmission of such *yao* to their transcription and document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It thus examines the impact *yao* had on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explores their soci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yao*, *yao* of a sonic world, *yao* of a world of words, Sima Biao, “Wuxing zhi” of *Xu Hanshu* 《續漢書·五行志》